

新时期国内技术本质问题研究的阶段性考量

朱春艳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沈阳 110619)

摘要: 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分为初始期、累积期和兴盛期三个阶段, 提出当前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还未达到成熟期, 这主要表现为关于技术本质的阐发还不够准确、系统, 应加强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 这样才有可能把对技术与科学的划界、进而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等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促进技术哲学学科研究趋向成熟。

关键词: 技术本质; 初始期; 累积期; 兴盛期

中图分类号: N 0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5)03-0252-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15.03.011

Considerations on Domestic Study of Technological Essence in the New Era

Zhu Chunya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619, China)

Abstract: The domestic study on technological essence since the tim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itial period, accumulation period and prosperous period. It is agreed that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technological essence has not reached mature period yet, which mainly consists in its unsystematic and inaccurate elucid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especially lead the studies of delimit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the programme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and other issues to a deeper extent and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the discipline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to the mature period.

Keywords: *technological essence; initial period; accumulation period; prosperous period*

技术的本质问题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国内外的技术哲学家一直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技术哲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伊始初期,经过了90年代的累积和酝酿,在新千年的转折时期出现了兴盛发展的态势。但应当看到,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至今尚未达到成熟

期,这主要表现为对技术本质的阐发缺乏特色,还未提出较为完整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并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

一、初始期:一元中的多样性

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界公认的中国技术哲学的

收稿日期: 2014-08-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10YJA720045);辽宁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L14BZX008);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wt2013005);东北大学“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研究项目(00000047103117/002)

作者简介: 朱春艳(1969-),女,教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E-mail: z25621334@163.com

研究起点,是1982年陈昌曙发表《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和差异》。在本文中,陈先生从科学和技术的区别开始阐述技术的本质,他从科学和技术在研究范式、功能等几方面的不同来阐述技术的本质特征,并阐述了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对技术哲学学科合法性的重要意义。此后,国内出现了对技术本质的多种规定。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技术哲学成立的合法性前提就是技术在本质上的相对独立性。

这一时期,国内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昌曙的《技术科学的发展》(1980)、《什么是技术论》(1985)、《技术哲学》(1985),陈文化的《试论技术的定义与特征》(1983)。远德玉、陈昌曙在《论技术》(1986)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在本质上“是一个过程”的“过程论”思想,至今一直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邓树增的《技术学导论》、陈凡的《论技术的本质和要素》都是国内较早研究技术本质的文献,他们提出技术在本质上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所掌握的物质手段、方法和知识等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的观点,认为把握技术的本质必须明确技术的范畴和技术的目的,技术过程指人的制造活动,而技术的目的“是控制和掌握世界,技术过程是人类的意志向世界转移的过程即劳动过程,必须明确技术的目的”。另外,刘则渊的《马克思和技术范畴》(1982)、《技术范畴: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1983),陈凡的《马克思论技术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是技术决定论吗?》等是国内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文献,对国内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与国内改革开放的主旋律相一致,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一开始就表现出开放性特征,学者们不仅引进不少国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与国外技术哲学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其中,在对国外技术哲学的译介方面,《技术与技术哲学》等介绍了日本、美国、德国等各国的技术哲学思想,中国科学院编辑的《科学与哲学》自1979年至1986年连续出版、翻译、整理700多篇外国技术哲学的文献资料,对我国技术哲学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国外研究机构的联系最初主要是与日本等国的联系,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这种开放性与区域性也体现在国内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之中。比如,东北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与日本的联系非常密切,并且受到了它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技术论”研

究就技术的本质问题提出了“手段说”、“体系说”、“应用说”等各种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受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技术论”研究的影响,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的研究,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技术问题的阐发,并在与日本技术哲学间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较少涉及。国内也正是结合日本“技术论”和前苏联有关的研究成果,展开对技术的本质和技术的定义、要素、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这一时期,相对于国外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性特征,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呈现出鲜明的一元性特征,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技术理论的研究。但这种一元性也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这突出表现在特色各异的技术定义上如“过程说”、“知识体系说”、“手段说”、“总和说”等,既有自己的本土特色,又表现出与日本等国家的技术哲学的联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技术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引入,开阔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对技术本质的解释也出现了多维视角,对诸如技术中性论、技术价值论等的论争开始深入。

二、累积期:沉默中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促进了国内技术创新、技术引进、知识经济、国家创新体系问题的研究,或者如米切姆所说,技术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却在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对技术本质的研究上处于低潮期,从而这一领域成为此时技术哲学研究的“最薄弱的”环节,尽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未止步^[1]。这一领域中的研究成果较少,技术哲学研究的兴奋点主要集中于我国技术发展和科技体制创新等应用问题的研究,似乎正应了美国哲学家唐·伊德的“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关注技术,但技术很少成为哲学家的主要主题。即使有众多著作关注技术对人的影响,但很少有关技术本质本身的”^[2]之断言。

这一时期的研究突出了技术的文化特征。从相关资料看,不仅引入大量西方技术哲学思想,提出了“技术文化”的范畴,突出技术的亚文化特征和功能,同时不少学者也自觉关注技术的文化性,探讨了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把文化性作为技术的第一特征,如武斌、贾杲等的《现代技术观的演变与走向透视》(1991)概括了现代技术观的四

种主要观点：技术决定论、文化主导论、自然极限论和条件总和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上面四种观点放到现代社会实践发展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揭示了现代技术观演变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性，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基本思路和实践综合论的初步设想。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则在国内开展技术的社会形成（SST）研究之前，较早从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入手探讨技术的文化特性。

对国外技术哲学思潮的引介构成这一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又一特征。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主要是海德格尔）、社会建构论、技术自主论等诸流派的技术观相继被引入国内，国内在学习和吸收的过程中在对技术的理解上逐渐走向多元化，也带动了对技术本质问题研究意义的思考与洞察。经过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学者们对研究技术本质的意义从开始强调的对实践活动的推动到对理论研究的推动意义，再到对人类生存的意义，逐渐将问题聚焦于人自身。关锦镗提出研究技术本质对技术哲学理论的建立和指导技术实践都有重大意义（1990），赵建军则提出，对技术本质的不同理解和把握直接涉及到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体系框架和学科建设等重要问题，可以说，技术哲学的发展与对技术本质的研究密不可分（1998）。同时，尽管专门论及技术本质问题的论文不算多，但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专著依旧不少，学者们大都在论及技术的其他相关内容时涉及到技术的本质问题，如陈凡把对技术本质的理解作为研究技术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刘文海提出把技术看作一种“追求物质目标的理性体系”的观点^[3]。

这一时期技术哲学研究的一大成果是陈昌曙的《技术哲学引论》（1999）。该书汇集了陈昌曙先生技术哲学研究近二十年的成果，书中不仅分析了技术工具论、技术价值论、技术自主论以及实用主义等国外技术哲学观点，还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展开了自觉的理论分析，从自然改造论、技术本质论、技术创新论等几个方面阐发了技术哲学的理论体系。本书不仅是国内第一部以“技术哲学”命名的专著，也是第一部系统介绍技术哲学各种观点的总汇。本书尽管未给出一个明确的技术本质，但贯穿全篇的技术改造论无疑表现出对技术的理解，那就是陈昌曙先生一贯强调的把技术理解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本质观。

三、兴盛期：“技术转向”中的研究热潮

新千年伊始，在国内哲学与社会科学中汇成一股强大的“技术转向”浪潮，不仅社会学、政治学把目标转向技术，一些科学哲学出身的学者也开始表现出对技术哲学的浓厚兴趣，为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000年在清华园召开的第八届技术哲学年会上，技术的本质问题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热点，表现出新千年的起点上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研究的新进展，其中陈昌曙在本次会议上对技术哲学讲的三句话——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强调了基础研究对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给技术本质研究注入了催发剂。他还提出了六组涉及技术本质的相关问题：1）究竟什么是技术？2）什么是技术活动的主体？3）机器是不是技术？4）能否说手枪是技术？如果是，该怎样定义技术？如果不是，手枪、DDT究竟是什么？5）技术是否仅仅与利用、变革和控制自然有关？6）什么是“高新技术”？“高”与“新”是相对什么而言的？^[6]并提出技术的本质问题必须回答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根本性问题，这引起关于技术本质的新一轮研究，以后的许多话题和论争都是由此开始的。

此后的几年间，我国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较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技术的本质问题上出现了自觉的商谈，主要在张华夏、张志林和陈昌曙、远德玉之间展开。几轮“商谈”显示出国内在技术本质观上的两个主要导向：陈昌曙认为技术是由各种要素、行动等组成的动态“过程”，张华夏认为技术是一个知识体系。这推衍出以下两种技术态度：一个认为技术问题是实践问题，从而在技术哲学理论体系中，技术价值论处于核心地位，另一个则认为技术问题是理论问题，从而在技术哲学理论体系中，技术认识论处于核心地位。这在2001年和2002年引领了国内新一轮技术本质问题研究的热潮，标志着我国技术哲学在技术本质问题上的研究进入了兴盛期。

第二，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有乔瑞金的《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纲要》和牟焕森的《马克思主义技术

哲学的国际反响》。这两部著作在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上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对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纲要》主要侧重于历史和逻辑(理论)的层面,而《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国际反响》则主要是关于国外学者对马克思技术哲学的梳理与评析。李三虎的《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探析》、《技术决定还是社会决定:冲突与一致——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社会理论》(2003),刘立的《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吗》等成果主要讨论马克思是否属技术决定论的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社会技术互动论(李三虎称之为“一种更为精制的社会技术整体论”)。于春玲^[4]从文化哲学的视阈解读马克思的技术本质观,提出在马克思那里,技术不是单纯的“物质手段”、“工具”或“劳动资料体系”,而是人类的感性活动形式、历史的存在方式或文化形式。基于这样的理论深度,马克思克服了知识论哲学技术本质观的工具主义局限,揭示出技术所蕴涵的现实的社會关系。

第三,对国外一些经典哲学家如海德格尔、马尔库塞、费恩伯格、唐·伊德、芒福德、埃吕尔、杜威等人的技术本质观的研究长久不衰,而国外新出现的一些流派技术观也开始引入国内。比如,对马尔库塞技术本质观的研究多数看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的社会批判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在马尔库塞那里,技术在本质上具有非中立性,它内在适合于统治。造就了“极权主义社会”,要克服科学技术对人性的压抑,必须把科学技术置于理性的指导之下,建立能够实现人的本质的“新科学”、“新技术”^[5-6]。又如,朱春艳^[7-8]等人系统评述了安德鲁·费恩伯格“整体论”的技术本质观,指出其包括“工具化理论”和“技术作为场所”两个层次,二者分别是技术的生成和技术的社会作用的不同视角上来理解技术。肖峰、安维复、邢怀滨、李三虎等人系统研究了社会建构论的技术本质观,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技术”二分法理论。

第四,国内学者在工程哲学、社会技术等领域的研究丰富了对技术本质问题的思考。工程哲学的兴起为从科学、技术、工程三者的比较中来思考技术的本质提供了可能,李伯聪的“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就是建立在对科学、技术与工程三者的本质区别之上的,肖峰对技术和工程之间界面的

解读进一步突出了技术的发明特征和工程的建造特征,也有学者从生存论层次展开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试图以此解决工程的技术哲学所面临的理论困境^[9]。这些研究成果在这一时期编写的高校《自然辩证法概论》教材中有所体现^[10-11]。潘天群从人的本质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技术存在的合法性问题^[12],田鹏颖、陈凡从社会技术的存在论、本体论、形态论、价值论、规律论等几方面论证了社会技术存在的合法性前提,提出“社会技术是调整和改善人(组织)及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进步和全面发展的实践性知识体系(方法、程序的集合),使人们在利用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掌握和运用的各种活动方式的总和”^[13],具有规范性、综合性和主体间性等三大特征。另外,肖峰^[14]从本体论的高度探究了技术的实在性问题,标志着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技术存在论,也就是从追问技术之“所是”到追问技术之所以“是其所是”的根源,推动了国内对技术本质的追问。赵乐静、郭贵春^[15]从国外技术哲学探寻研究技术本质问题的切入点,对本质主义的技术观和非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后本质主义的技术本质观作了对比分析。

尽管研究技术的本质问题对技术哲学学科的意义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就如何进行研究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陈红兵等人提出,刚入道者对“技术是什么”的问题可以知难而退,免得纠缠不清,转而从技术与人工自然、技术与科学、技术与生产、技术与工程的关系、技术的源泉与要素(工具、机器、经验)来描述和分析技术^[16-17]。张华夏等人针对这种观点,直接提出不能回避对“技术是什么”的追问^[18],李河也提出,技术哲学本身的合法性应当是“技术转向”关心的首要问题,而这只能通过以哲学方式追问技术才能获得。这种哲学的追问方式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之一,就是“描述那些使技术成为技术的条件,即技术的本质问题,而不是追问‘与技术有关的东西’”^[19]。

四、问题与反思

第一,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在总体上水平有很大提高。技术本质问题作为技术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它的研究可以折射出国内技术哲学发展状况的变迁。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经

历了从最初的把技术理解为“手段”、“技能”到“工具”以及“各种手段、工具的总和”的观点,进一步从技术与人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层面来思考技术的本质问题,从而不再仅仅从物的层面上,还从生存论的层面来看待技术,开始考虑到技术的文化本质,从人的生命的根基处来阐述技术的本质。如郭贵春在展望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未来发展时把对技术本质的关注视为“我国技术哲学补‘现代化’这一课所必然要面对的问题”^[20],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技术本质的关注将更加密切。

第二,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从一元走向多元,但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观仍占主导地位。国内技术哲学研究最早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内展开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理论普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是同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联系密切的日本“技术论”,也是在日本的“唯物论研究会”影响下展开对“技术论”研究的。因此,国内早期的技术哲学研究,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技术问题的阐发,如陈昌曙、刘则渊、陈文化、陈凡等学者的早期相关成果,都明显表现出一元性和地域性倾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同国际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研究也日益呈现出多元性和国际性特征,对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建构论、现象学、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等流派的和苏俄等国家的技术哲学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对其技术本质观也作了相应研究,都明显表现出研究上的多元性和国际性。

第三,国内技术本质问题研究的突出特点是独创性内容偏少。应当说,国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研究”阶段,除远德玉、陈昌曙的“过程论”外,还鲜有学者提出具有独特见解的技术本质观,更多的是对他人思想的研究或引介。换言之,多为“照着讲”的诠释性,而鲜有“接着讲”的独创性,而在技术本质观问题上的含糊恰恰又造成国内对技术的构成要素、技术与现代性问题、技术认识与技术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进展缓慢,难有突破。

技术哲学有着鲜明的跨学科特征,这表现在对技术本质问题的研究上,也要求从不同角度研究技术本质在技术哲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技术本质的不同观点(技术决定论、技术中性论、社

会决定论、价值决定论等)等问题进行思考。这对国内技术哲学研究而言,从引进、吸收到创新,还会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张培富,李俊. 中国技术哲学“九五”发展统计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9(3):58-61.
- [2] Ihde D. Instrumental Realism[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3.
- [3] 刘文海. 论技术的本质特征[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10(6):31-37.
- [4] 于春玲,李兆友. 马克思技术本质观的文化哲学视阈——兼论对西方哲学技术本质观的超越[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6):471-476.
- [5] 夏鑫. 试论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观[J]. 江西社会科学,2008(2):57-61.
- [6] 刘晓玉. 论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3):195-199.
- [7] 朱春艳,陈凡. 费恩伯格技术本质观评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9(9):49-53.
- [8] 朱春艳. 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
- [9] 张秀华. 技术工程观的困境及其生存论改造[J]. 哲学动态,2004(6):22-26.
- [10] 黄顺基. 自然辩证法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11] 陈凡. 自然辩证法概论[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 [12] 潘天群. 存在社会技术吗?[J].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12(10):16-19.
- [13] 田鹏颖,陈凡. 社会技术引论[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43-44.
- [14] 肖峰. 论技术实在[J]. 哲学研究,2004(3):72-79.
- [15] 赵乐静,郭贵春. 我们如何谈论技术的本质[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21(2):45-50.
- [16] 陈红兵,陈昌曙. 关于“技术是什么”的对话[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4):16-19.
- [17] 陈昌曙. 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127.
- [18] 张华夏,张志林. 关于技术和技术哲学的对话——也与陈昌曙、远德玉教授商谈[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8(1):49-52.
- [19] 朱葆伟. 技术哲学研究综述[J]. 哲学动态,2001(6):29-32.
- [20] 郭贵春,张培富.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未来发展展望[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8(5):14-17.

(编辑: 巩红晓)